

行政及策劃組

行政及策劃組的工作主要分為兩部份：管理資料館的人事行政事務和統籌資料館永久大樓的興建工程。前者是每日的運作，後者則是一項預計在一九九九年完成的建築計劃。現時資料館的籌劃辦事處有十多個職員，處理資料館多方面的事務，包括：出版、展覽、研究、搜集、編目和修復等工作。至於大家期盼著的資料館大樓，淨面積 2,500 平方米，館內設有展覽館、電影院、圖書館及影片庫等設施。

搜集組

電影資料館旨在搜集新舊香港電影和有關的電影資料，因為要不斷在本港和海外進行搜集工作，這個部門跟外間和電影界的接觸最多。要保存電影作為文化產物，這個觀念在香港仍然是在建立當中。所以這個部門一方面通過游說個別人士或公司，希望他們能把電影寄存或送給電影資料館，而另一方面，這項工作本身亦帶有推動保存文化意識的意義。

修復組

電影修復部門的主要工作是保管及修復影片，為了妥善保存香港的電影文化，修復組的成員都受過專業訓練：有曾赴英國專修文物和電影修復課程；及往美國伊士曼電影學校深造電影菲林理論和技術管理的助理館長，亦有十多年從事電影製作、保存和修復工作經驗的技術主任。電影的保養修復工作範圍十分廣泛且艱巨，正如涓涓細流，源源不斷。它主要包括用科學方法管理影片片倉、修復電影拷貝、參與數碼技術修復影片，及將收集的電影海報、劇照進行修復保存。電影修復組現時在鯉魚門的臨時片倉工作。這個片倉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貯存資料館的藏片。隨著電腦數碼技術的普及，運用到影片修復上已指日可待。屆時修復工作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圖書館編目組

資料館現時已收集了二萬五千多份電影資料，編目組的同事，正努力把這些圖書、期刊、報紙、海報、劇照、相片、特刊等，逐一用檔案室專用文儀裝好和詳細編目。這是一項繁複而細緻的工作。正式成立之後的圖書館，是一間參考圖書館，內藏逾三千冊中外電影書籍、五十份中外影視期刊，更有剪報和有關特刊供研究人士參考。館內還有視聽室，研究人士可在特別設計的房間內觀賞資料館的藏片。除此之外，電腦化的設備更方便市民查索香港電影的資料。編目組正為一九九九年的開幕密鑼緊鼓。

研究組

研究組主要的工作之一，是為《香港影片大全》搜集資料。組員四出翻查舊報紙、雜誌、本事等，希望能從中整理出香港早期電影的脈絡。出版《香港影片大全》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計劃，研究出版的片目會從戰前延伸至九十年代。除此之外，研究組亦要為資料館每年舉辦的大型展覽搜羅展品及編寫特刊。每年的二月及九月更在文娛中心舉辦主題性的電影放映。研究組的「口述歷史」計劃，更會不斷訪問新舊影人，從個人的歷史中，勾劃出香港電影業的種種。

編輯及展覽組

這部門的重點任務是負責編輯每年出版一卷的《香港影片大全》。編輯組統籌整個出版過程，包括安排撰寫和翻譯稿件、設計和印製。這個部門亦要負起統籌展覽製作和出版特刊的工作，例如今年四月在大會堂舉辦的「穿梭光影五十年」展覽。這次出版的《資料館通訊》也是由編輯部主編的，每年預計出版四次，定期報導資料館的活動、最新動向和籌辦專輯。



修復組同事正努力檢查影片的菲林。



研究組策劃余慕雲先生在翻閱舊報紙。

徵集大行動

你有以下的東西嗎？

電影音樂唱片
影片菲林 電影海報 手稿
電影劇照 特刊 雜誌
明星相片 本事 劇本 合約
娛樂新聞剪報 影評 電影廣告

在過去的兩、三年間，電影資料館獲不少熱心的片商、電影工作者及市民支持，慨贈珍貴的影片和文物，令我們的藏品日益增加。到現時為止，收集到的電影已達 1,800 部，而電影劇本、劇照、海報、相片等文物，亦已超過 25,000 份。但這個保存香港電影文化的重大任務，需要你們不斷的支持。希望你把擁有的香港電影和有關資料捐贈本館，收集所得的物品，我們會妥為貯存和保管，供研究和教育性活動之用。請致電 2739-2139 與本館聯絡。



陳雲先生捐贈的剪報冊，其中收藏了《兔女郎》(1967，秦晚濤導演)的珍貴報紙廣告及評論。



長城影業公司名片《蕩婦心》(1949，岳楓導演)之特刊 (童月娟女士捐贈)。



亞洲影展得獎名片《後門》(1960，李翰祥導演)之劇本 (馬斐先生捐贈)。



志聯影業公司名片《鄉下妹出城》(1965，黃堯導演)之劇照 (胡鵬先生捐贈)。

電影的歷史·歷史的電影

從《香港影片大全》談起

蒲鋒

對於一個香港電影的研究者來說，看到資料館的這部《香港影片大全》是很值得高興的一件事。由於對香港戰前電影的研究長期空白，只有通過一些影人回憶錄才能看到戰前電影面貌的一鱗半爪。從影人回憶錄看戰前電影，不單對其主演的電影會模糊不清，亦往往會由於沒有基本資料印證而變得對其個人經歷難以有清晰印象。

我自己有本白燕寫於一九五六年的回憶錄《錦繡青春》。這本書主要談她的入行經過及愛情生活，對於自己的影藝事業很少道及，只粗略地提到她初出道時拍過的兩三部電影，而且都講得不清楚。例如她提到處女作《錦繡河山》，但連年份也沒有，用《香港影片大全》一查，才知那是一九三七年的電影。她又提到吳楚帆的第一任妻子黃笑馨曾演過一部賣座電影《半開玫瑰》，從此得到「半開玫瑰」的綽號。本書亦提供了《半開玫瑰》是一九三六年的戲，而且從劇照中看到黃笑馨的樣子，閱讀白燕這本書的趣味因此大增。

《香港影片大全》在每部片都盡量提供影片公映年份、工作人員名單、故事簡介及劇照一幅。雖然提供的內容好像不多，但卻已能提供一些現象讓讀者思考。例如單憑《孟麗君》、《背解紅羅》、《三審玉堂春》、《血濺桃花扇》等片目，已可看出粵語片所受中國戲曲的深厚影響。但另一方面，看書中提供的劇照，我們卻可看到美國電影對香港時裝片的影響。伊秋水扮差利，馮峰演泰山都是至明顯的。還有在劇照的造形設計上，人物的裝扮方面，都有很濃的美國電影影子。看三十年代多部電影主角如《難兄》的吳楚帆、《昨日之歌》中的新靚就（關德興）、《野花香》中的馬師曾的頭髮都蠟到油光熨貼的造形，便是當年美國片的典型。還有薛覺先的《白金龍》是改編自美國電影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此外，有些影片故事取材自社會實錄，當年便已有些著名凶案為題的電影，證明《人肉叉燒包》式電影亦有電影史的淵源。這部片目為未來的香港電影史研究者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

可能長期以來香港電影史料太多空白之處，所以每接觸到一些新史料都會覺得彌足珍貴。一般來說，電影資料首先當然是影片本身，能夠看到一部舊片是研究者最直接的資料來源。把舊片搜羅、修復、保存、提供放映機會相信也是很多人對資料館最大的期望。但是在電影之外，還有很多資料是需要保存，而作為一個普通研究者來說，現時香港在很多方面的資料都是極其缺乏的。例如《香港影片大全》所提供的基本片目，有很多電影我們都可能已沒機會再看到，但知道有幾多影片是無法再看到的，本身便是一種知識。

資料館在搜集資料之餘，也應要製造史料，我指的是應開展口述歷史的工作。我稱為製造是因為那些資料存在於影人腦中並未成為可以應用的資料，要把它記錄成文字那才是真正的資料。香港影人撰寫回憶錄的情況並不普遍，即使有憶述，流於與明星交往的私生活傳聞和影壇祕事的情況為多，李翰祥的《三十年細說從頭》及《天上人間》兩套書便是一例。李的文筆詼諧風趣，筆下的影壇人物也活靈活現，也保存了不少影圈人物資料及當年影圈情況。但是就是太過娛樂性豐富，對於他自己拍片的心得，多年來拍片的藝術要求和取向，都很少提及，甚至看完全書，也無法整理出他導演及監製生涯的片目，那真是很大的遺憾。相比起來，同是香港電影中最重要的導演，張徹的《回顧香港電影三十年》，便既提供珍貴的史料，也能提供不少他以及同時代人對電影的看法。但這樣的著作其實很少，即使李翰祥式的雜談形式的拍片回憶也不多。

但影人的回憶始終是極之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既然香港影人不大撰寫回憶錄（或撰寫了沒機會出版），資料館有需要做口述歷史的工作，找人盡快訪問些老經驗的影人，訪問他們的經歷及早年香港電影的生產體制等。口述歷史是一個與時間競賽的工作，隨著時間的推移，老影人記憶會愈來愈模糊，更加會死去。今天要找人意述五十年代電影歷史已很困難，再過五、六年可能找人回憶六十年代的電影歷史也困難。

在口述歷史的工作中，我認為訪問幕後工作人員比幕前工作人員還要優先。幕前演員一向是傳媒重心，所以會留下較多文獻紀錄，雖然不免多訛錯及表面，但還是存在的，幕後工作人員的紀錄才真是一片空白。其中電影界一向認為極之重要的編劇、攝影、美術、音樂幾個部門的資料便從不見紀錄。而我們也想像得到，編劇、攝影師都不是名人，當然不會撰寫回憶錄，那麼由他人訪問以獲取資料、製造資料便是很重要的工作，有時會有些意想不到的結果。我曾經訪問林蛟搜集一些粵語片武師的資料，閒談中他提到在拍《黃飛鴻水底三擒蘇鼠廉》時攝影師如何拍水底鏡頭。雖是土法方式，但也總算拍出特色，相信由這些崗位的人提供資料，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資料出現，例如一些如何吸收外國技術的問題，他們才能提供到確實的證據，他們使用哪一款機器也是很重要的資料，因為憑這些便可以推想得到他們在工作時所受到的限制以及他們如何克服這些限制。

還有一個搜集資料的方向值得一提，人所共知香港電影與粵劇的關係深厚，由故事、演員到編劇（前四集《黃飛鴻》的編劇吳一嘯是有「曲王」之稱的粵曲撰曲人），甚至放映場地都有關連，所以電影史料和粵劇史料分不開，很多電影史料正藏在現成的粵劇史料中。舉例來說，薛覺先名劇《胡不歸》曾多次搬上銀幕，它是改編自日本小說《不如歸》一事在粵劇資料中是常識，但一般影評人好像未必知道。

蒲鋒：影評人及專欄作家。一九九一年開始為各報章撰寫影評。現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

香港電影中的歷史

梁秉鈞

過去許多年來，大家公認香港是一塊沒有歷史意識的地方，論者多指出這與本地的政治風氣、社會取向和教育政策有關。近來香港電影中一個典型自嘲場面是《胭脂扣》裏的一幕：在報館工作的男主角在電車上發覺眼前的女子竟是從昔日回到陽間的女鬼，嚇得連連後退，倉惶大嚷：「不要嚇我！我會考歷史不合格的呀！」

但從《胭脂扣》出現到現在的這十年間，情況有了顯著的轉變。先是由《胭脂扣》及同類電影帶起的懷舊潮，也見諸飲食業的「陳茶館」和時裝界的「上海灘」，在普及文化方面掀起一陣重認「過去」的風氣。在後過渡期的階段，愈接近九七，各方面對「歷史」的問題愈加關懷。出版社推出不少香港歷史的論著和圖冊（如王賡武主編的《香港史新編》、高添強的《圖片香港今昔》、以及三聯、商務、文匯報等出版的各種圖冊），香港電台電視部續拍八四年開拍過以香港歷史為題材的《香江歲月》、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攝的《香港滄桑》、還有香港電台電視部的《一起走過的日子》、《千色教室》。亞視的《成長話香江》、無線電視台的《香港傳奇》、《香港：一個年代的終結》、以至《九七變色龍》、《歸航》、無線的《難兄難弟》、《香港的故事》、在香港電視播放的內地作品《林則徐》等。近月在香港上演的電影，便包括了香港導演張婉婷以歷史人物為題材的戲劇作品《宋家皇朝》，以及中國大陸導演配合回歸節慶巨資製作的《鴉片戰爭》。從過去對歷史的冷淡，一下子香港近乎弔詭地處身於一種「歷史」的熱潮之中。

本文嘗試勾勒這十年間香港電影對歷史處理的幾種做法，並探討在商業與政治的潮流底下，是否有一些空間讓香港人反思歷史，以及對歷史抱持了怎樣的態度。
（註一）

（一）史實的求真與虛構

評論家馬·菲羅(Marc Ferro)曾論及種種看待歷史電影的態度，其中最常見的一種是驗證電影表達的事件與人物是否見諸歷史的記載、甚至進而考證佈景或美工是否符合某時代的風格。在香港導演中，早一輩的李翰祥和胡金銓都有這種要求。而且有時即使內容上是歷史人物事件的戲劇性處理，也會在佈景、道具方面認真要求接近歷史的考據。有時這也成為評價電影的根據，例如李翰祥批評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就是從某些細節與史實不符著眼。

但因為香港電影商業製作的考慮，考究的製作成本高、時間長（如胡金銓的作品），就較難找到支持了。而且觀眾會覺得純歷史的題材沉悶，不會樂於購票進場。所以即使在細節上考究史實的導演，在更大的題材上無法不兼顧娛樂性與戲劇性，形成了作品中的內在矛盾。

（二）懷舊潮、梟雄片與無厘頭的歷史觀

若果不限於嚴格的歷史電影，而去實事求是地回顧香港電影近十年如何在種種限制之下思考歷史問題，那我們倒有一些例子可供思索，或可勾勒出一些朦朧的意識的形成。我們可以參照研究歷史與電影關係的學者羅伯特·羅臣斯頓(Robert Rosenstone)的角度，即認為「歷史並非僅關乎過去現象的知識，亦關乎現在與過去的連繫，對連續與斷層的追溯」，以及其他電影評論者如希夫(Heath)的意見，即認為電影並非反映，而是一種中介，通過影像去建構意義。

第一種懷舊電影以《胭脂扣》開了先河以後，產生了不少以昔日石塘咀風月場所為背景的通俗文化產品。電視台的《香港傳奇》節目，曾以電影《群鴛亂舞》與舊新聞圖片並置作為昔日生活風俗的解說，似乎正是誤解了電影作為「中介」而非「反映」的本質，以及懷舊電影的特色。「懷舊」代表的正是一個今日的立場（懷）回看過去（舊），有感情上的緬念、距離造成的美感、或主觀的解釋與借用。懷舊成為潮流，也會令歷史變成消費的可愛精品。高志森、杜國威合作的《我和春天有個約會》(1994)、《人間有情》(1995)及《南海十三郎》(1997)在商業上取得極大成功。《人間有情》一開場顯示港台電視部式的記者採訪來增加「真實感」，甚至用當代數碼影像處理方法，仿效《阿甘正傳》把歷史人物如蔣介石，與後面窺望的劇中角色拼在一起。但這些人物的戲劇故事與歷史大背景之間，只是一個拼湊影像之間的關係。反而沒有《胭脂扣》那種一方面懷舊，一方面突顯今昔之比、顯示過去價值觀念在現今無以延續的複雜想法。

以劉國昌的《雷洛傳》(1991)為代表的梟雄片是八十年代英雄片的延續，卻在九十年代加入對五、六十年代香港街頭歷史的回顧。做得好的時候顯示了一種對過去生活人情的致意，做得簡略的時候也會把香港的歷史簡化為一幕由貧窮掙扎致富的歷史。

帶有後現代意味的《92 黑玫瑰對黑玫瑰》、《新難兄難弟》等，電影裏面的歷史是舊粵語片中的歷史，對電影如何營造集體意識作出反諷的戲謔，好處是消解了「反映現象」之說，突出了中介媒介的繽紛多姿，但要在其中尋找歷史卻可能是緣木求魚了。

（三）徐克「黃飛鴻系列」中的詠史情懷

論者謂新的歷史電影往往產生於一個社會急切地需要歷史連繫的時刻。看黃飛鴻系列，除了指出徐克與史實不符的部份以外，我們也可以看看他如何借古喻今，對中西文化的衝突提出看法。如《黃飛鴻之二男兒當自強》中以虛構的孫中山軼事來強調時間的重要、強調中西文化彼此取長補短的理想，又以改寫了的白蓮教事蹟來對狂熱民族主義者提出批評，以一群華裔小學生的遭遇寄寓了魯迅式的中國的沉痛希望：若果捱過今晚，我們就可看到明日的陽光。

最成功地以電影語言表達詠史感情的是黃飛鴻誤闖十三姨香閨之後憑欄遠眺的一場：以一闕南音的娓娓演唱，配合畫面上紛亂的街頭和眾生。歌聲點出一個愁人猶豫面對前路，鏡頭搖上呈現黃飛鴻面對紛亂的世界，四邊一片迷亂、野狗爭食、國人吸食鴉片，歌聲代主角說出他欲從戎又不能退隱，西風緊迫之下憂時傷國與兒女私情兩難全的苦況。至少在這一個難得的抒情片段裏，徐克這位香港導演以流暢瀟灑的電影語言，表達了他的歷史觀點和對現世的感懷。

註釋：

（一）拙作〈香港電影與歷史反思〉，嘗試較理論性地探討歷史問題，發表於香港浸會大學主辦的「第一屆國際華語電影學術研討會(1980-1996)」，1996年9月17日至21日。

梁秉鈞（筆名也斯）：詩人，小說家及文化評論者，現為嶺南學院中文系教授，著有多本詩集、小說集及有關文化的評論，如《香港文化》、《書與城市》、《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等。